

民国服装史



徐华龙 著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对中国服装的嬗变起到根本性作用，掀开了中国服装发展新的一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

民国服装史

徐华龙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标志着封建帝国的崩溃和民国政府的成立。与之相适应的服装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山装和旗袍确立了中国男女现代服装的诞生。然而民国服装的进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各种各样的非议与阻挠,最终在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成功转型,有了现代社会的服饰文化。

本书主要介绍1911年到1949年民国服装的发展。其中包括山东及少数民族地区服装变化以及与当时民众生活、经济、社会的关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服装史 / 徐华龙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13-14163-7

I. ①民… II. ①徐… III. ①服装—历史—中国—民国 IV. ①TS94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134 号

民国服装史

著 者: 徐华龙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 本: 710mm×1 000mm 1/16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4163-7/TS

定 价: 6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8.25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33854186

民国时期的服装文化研究,过去并不太多,其主要原因是资料散乱,有的更是难以寻找。

其实,民国时期的服装,是中华民族服装历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封建帝国服装制度的终结,新的共和政府服装文化的建立。其文化形态就充分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类型,早期那种创建新的服装文化的艰难,以及后来服装文化的多样性及丰富多彩,构成整个民国服装发展的完整链条。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服装已跟不上时代发展,有识之士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当时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看来,改变传统服装制式,已经刻不容缓,与放足、断发一样重要,这是革除陋习,使服装便于工作,便于生活。

民国服装变化,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国内外生产布料技术的大大提高,这些中外生产的衣料,大大地丰富了衣服的颜色和款式。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服装,其变化一般是缓步进行的,但有明显的社会痕迹。这种服装的变化,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演进的。在旧的服制被更替、新的服制尚未成熟之际,新旧衣服开始交替出现。

人们接受外来服装的款式,是由于西式服装以它方便、实用、合体的优点得到年轻知识阶层和上层人士的青睐。对西服的缺点,当时有人描述得淋漓尽致,诸如领带卡脖子、硬领不舒服、手套不方便,等等,均为中国人所不习惯,价格也比较昂贵。出现这样的感觉,是因为西装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服饰,因此才有了这样强烈对比的感受。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精英和上层人士的西装革履对整个社会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这时候,怎样使西服平民化、大众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俗,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提倡国货加速了西洋服饰中国化的进程,中山装就是中西合璧的产

物,而更多地融入日本文化的元素。

旗袍的出现,真正体现了女性的文化,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服装,又嵌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旗袍就是女性在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服饰,至今依然流行,这是运用中国的旗装与外国的缝纫方法与审美理念相结合的新的服装。

从民国时期开始,服装的功能区分逐渐清晰,制服已经成为某个职业的标志。警察有警察的制服,军队有军队的服装,老板穿的是长衫,伙计则穿短衫,都有一定的服装规定。

应该说,民国时期所形成的服装礼俗对以后的习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国是现代社会的发轫时期,奠定了中国 20 世纪以来服装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正确的倡导与有识之士孜孜不倦的追求中,民国服装不断进步,不仅有了崭新的中山装与旗袍这样标志性的男女服装,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加使得这种多样化的服装文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2015 年 8 月 13 日

目录 | CONTENTS

绪论：辛亥革命开创中国服装的新纪元 / 001

上编 / 031

第一章 新旧交替的服装文化(1911~1920年) / 033

第一节 传统与变化 / 035

第二节 洋布与土布 / 044

第三节 崇尚与非议 / 049

第四节 基础与发展 / 054

第五节 社会毒瘤 / 059

第二章 特征渐显的服装文化(1921~1930年) / 071

第一节 检朴 / 071

第二节 模仿 / 073

第三节 改良 / 079

第四节 发展 / 088

第三章 繁华夺目的服装文化(1931~1940年) / 104

第一节 争辩 / 104

第二节 时装 / 109

第三节 搭配 / 121

第四节 差别 / 126

第五节 形体 / 132

第六节 影响 / 138

第七节 追逐摩登 / 142

第四章 趋于成熟的现代服装文化(1941~1949年) / 167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 / 167

第二节 皮装与绒线 / 172

第三节 服装与语言 / 181

第四节 胡朴安笔下的各地服装图景 / 187

下编 / 203

第五章 传统、平实向时髦的转型时期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服饰文化 / 205

第一节 时尚服装的展示 / 205

第二节 对时尚衣饰的抗争 / 212

第三节 原因何在 / 217

第六章 山东服装文化 / 221

第一节 延续传统文化 / 222

第二节 体现时代特征 / 226

第三节 服装民俗韵味 / 237

第四节 民国时期山东服装形成的原因 / 240

第七章 边疆民族服装 / 247

第一节 一种文化符号 / 247

第二节 基本现状 / 257

第三节 与社会自然的关系 / 262

第四节 生产与交易 / 271

参考文献 / 277

索引 / 279

后记 / 282

绪论：辛亥革命开创中国服装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是推翻帝制的革命运动,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一个封建王朝推翻另一个封建王朝,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封建走向共和,从专制走向民主,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样,辛亥革命也对中国服装的嬗变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掀开了中国服装发展新的一页。尽管在此之前,中国服装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举成都为例,晚清时期其服装亦改变甚巨。有人说:“近来成都讲究穿着,女衣则尚简便,不似上年之华丽宽大。男衣则尚窄小,多用苏洋各料者,皮衣则年贵一年。凡省城之做现成之新女衣,多在暑袜街及总府街、新街、科甲巷四处售。做现成之男衣服,多在总府街、鼓楼南街及会府街。如出当之旧衣,及公馆内变售之衣服,均在会府及鼓楼南街售,然须防一种改消子。改消子者,言改作之衣裳也。凡改作者,其褊子揉之有声。惟买衣服时,其衣铺之店多招呼买主,争拉可厌,亦可笑耳。”^①

1923年湖南《慈利县志》记载:“辛亥革命,男去辫发,女弛裹足(惟苗耳恶习今尚沿,未尽革),诚咄咄二大快事。然美犹有恨,内争踵接,议礼未遑,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②

可见,辛亥革命推动了服装的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穿着观念与习惯,同时也为新的服装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

① 《成都通览》(下),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70页。

②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页。

一、打破等级观念

在清代,对于服装有很严格的规定。就衣服而言,有公服和私服之分,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半步,当官的有当官的服装,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服装,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当官的服装,不仅仅用来裹住身体,同时还是其身份的标志。因此,不允许老百姓乱穿衣服,他们的穿着受到严格的限制。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冠服》:“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然而便服裘帽,惟取华丽,或倡优而僭拟帝后,或吏仆而上同职官,贵贱混淆,上下无别。始康熙九、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命服悉照前式:貉、裘、猞猁裘,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装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花素绫绸纱及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皮,素绸罗绢及蚕绸葛布、三梭细布而已。其官职及举、贡、监生、生员之父,除公服而外具得并从子服。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子,除公服而外,具得并从父服。禁令初颁,一时翕然敬畏,恪守凜遵;但旧服尚存,新不及制,好事之徒,或挟仇举首,或借端索诈,或恣肆抢夺,狱讼纷起,京师尤甚,当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饰之华丽,又复惟力是视。”^①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知道:

(1) 官服的定式在清代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可僭越,然而便服帽子的规定就不那么清晰,出现“贵贱混淆,上下无别”的现象。

(2) 到了康熙年间,再次重申各种官服穿戴的规矩,这种严禁的法令一经颁布,人们“翕然敬畏,恪守凜遵”,可见禁令之严厉。

(3) 不久之后,这种规定稍弛,民间的穿着顶戴就又开始慢慢变化,人们更注重服装的美观,并且以各自的经济实力来体现衣服的华美。

不过,整体而言,等级观念的服装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基本规则。封建社会将人划为三六九等,是其统治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才能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服装是反映这种差别的最直接、最直观的符号,由此

^① 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不难看出服装等级制度本质之所在了。

举例而言,清末的帽子,有官帽、便帽、小帽之别,显然是等级观念的反映。

清末的官帽,民间称为大帽子。大帽子有两种:一是暖帽;二是凉帽。暖帽是冬天及春天戴的,凉帽是夏天及秋天戴的。在暖帽换戴凉帽,或凉帽换戴暖帽的时候,官家颁布一个日期,无论官民人等,一律遵守。这个规定,谓之“换季”。暖帽有种种,跟着天气时令而更换。帽檐是黑色的,中间是一个红帽纬。暖帽的帽檐,有缎子的、有呢子的、有珠呢的(冬初时用);有皮的,皮之中有貂的,则为品级已高之官员可用。皮的暖帽,其用最广,因为一个冬天及新春,都是戴皮帽子的。

大帽子上,最高部分,就是一颗顶珠(俗称顶子者,非是)。最贵的是红顶珠,其次是蓝顶珠,(蓝有明蓝、暗蓝之分),再其次是水晶珠、白石顶珠、金顶珠,最下属没有顶珠。没有顶珠,便是没有品级,所谓“未入流”便是。文官如此分等级,武官也是如此。

而普通老百姓则没有当官的帽子的装饰。仆人无顶戴,夏日戴凉篷,亦用红色羽纓。纬帽,是清代作为礼帽的红纓帽,在夏秋季即以纬帽为之。《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四回:“这几天要换了季还好,再不换季,一只手挎着个筐子,脑袋上可扛着顶纬帽,怪斗笑儿的,叫人家大爷脸上怎么拉得下来呢?”有时候,纬帽上有用白色或湖色熟罗为胎者,亦有用黄花纱胎及用竹丝已纹胎者,随时令而定。

在清代的衣服制度上,即风帽也有阶级,非一二品大员不能戴大红风帽,若士庶们只能戴蓝色风帽,到后来也都不拘了。老太太们以及和尚尼姑,也都有戴风帽的,大概是黑色。

帽子同样讲究颜色的等级。清末,冠礼称为大帽子,那么便冠就称为小帽子了。小帽子在春冬两季所戴的,以缎为之;在夏秋两季所戴的,以纱为之。小帽子一般为黑色,惟夹里大概是用红布,纱制的用单层,或里面以竹丝为胎。倘然在服丧期内,小帽子以黑布为之,夹里亦是蓝青色。小帽子上有一结子,普通都是红色丝织的,若有三年之丧的,戴白结子,期功之丧戴蓝结子。官场中人,虽在重丧中,往往不戴白结子,而戴一黑结子,因为从前官场中,忌见白色孝服,谓为

不吉(官场中最怕丁忧)。

在男子的官服中,在古代是纱帽圆领,在清代也随时令而改变。礼服的领子,称为硬领,春秋之际,用深湖色或者月白色之缎;到了冬天,或用绒,或用皮;有丧的人,则用黑色。此外,还有一种披肩,文武大小官员,穿大礼服的时候所要用的^①。

到了清末,这种严格的服装等级制度遭到了破坏,人们不再一味地按照阶级的等级来穿着衣服,而更将衣服看成是有钱人身份的象征。过去是等级制度决定了人们的服装打扮,到了辛亥革命前夕,这种局面被打破,人们开始用钱来表现自己的地位与身价了。

在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里就有这样的描写:

有一天,书玉坐着轿子在一品香出局回来,轿子走到大新街口,忽然迎面撞过一个客人,正在四马路走过,轿子走得甚快,那客人也低着头直撞过来,恰恰撞了一个照面,轿夫避让不及,彼此一碰,把那客人仰面朝天的跌了一交。那客人在地下扒了起来,心中大怒,一把扭住了轿夫的衣服,喝道:“你走路不带眼睛的么?乱撞你娘的什么?”轿夫见那客人衣服鲜丽,气概出众,却也不敢得罪他,况且委实把他撞了一交,只得陪着笑面,说声:“对不住,实在没有看见。”那客人那里肯放,要叫巡捕到来,把轿夫带到捕房里去。张书玉坐在轿中,一眼看见那客人的手上带着三个金刚钻戒指,晶宝夺目,光彩照人,身上穿着一身外国缎子的衣服,颜色配搭得甚是匀称,更兼仪表轩昂,身材俊伟,生得倒还不俗。看了他这般气派,晓得定是个有钱的阔客,便有心要笼络着他,对他嫣然一笑道:“大少对勿住,总是轿夫勿好,碰仔耐一交筋头,勿得知身浪向阿曾碰痛?”说罢星眸低漾,杏脸微红,含羞带笑的瞧了那客人一眼。这一个眼风,就把那客人的身体酥了半边,动弹不得。本来是一腔怒气不肯干休,被张书玉这样一来,不知不觉地把心上的焦躁,一霎时销化个干干净净,连忙放了轿夫,笑嘻嘻地答道:“不妨不妨,没有什么要紧。”那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张书玉看个不住。张书玉见了,晓得他

① 屠诗聘:《上海市场大观》(下),中国图书集志公司1948年版,第22~23页。

已经入彀，又微微一笑道：“晏歇点阿到倪搭去坐歇？倪来浪新清和第三家。”那客人听了大喜道：“很好很好，停回儿我一定过去。”书玉笑道：“晏歇点要来格哩！”那客人连连答应，轿夫放开脚步径自前行。临走的时候，书玉还欠起身来回头一笑，略略地朝他点点头儿，一直回新清和去了。^①

在这里，那个客人被描述成为：“衣服鲜丽，气概出众”，“手上带着三个金刚钻戒，晶宝夺目，光彩照人，身上穿着一身外国缎子的衣服，颜色配搭得甚是匀称”。张玉书本是个上海滩上非常知名的花界名流，当然见不得别人冲撞她的轿子。但是一见客人如此打扮，肯定知道其有来头，便和颜悦色与其打招呼。这种态度的转变，与其服装的打扮有直接的关系。

清末的上海滩，已经不再是官服一统天下，而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服装得到了展示，当然也包括有钱人的服装。

在全体国民剪辫的同时，也进行了服装改良。过去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衣冠之治，由于制度本身被推翻，而其合法性不存在而被取缔，这是因为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种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服装做法，引起不少人的强烈共鸣。一本署名为《青年》的杂志，刊载《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文章，认为穿长衫的“不是政客、官僚，就是骗子、阔少爷”，就像“男人的胡须，要来有什么用？何不就剃除呢”^②。

有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洗澡》叙述道：“我蓦然记起有一位文人好像说过，在池子里洗澡的人都是平等的，望望富人身上所有的，在穷人身上一件也没有缺，但一到外面，一个套上纺绸裤，一个套上青布衫，于是阶级马上分明。”^③从衣服上可以看出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其实在他们脱去衣服以后，人都是一样的，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服装等级制度。

辛亥革命之后，即着手服装改革，首先是从官员做起，以新礼服代替旧式官服。第一要义是在礼服中贯彻平等的原则，不分级别的高低，也不分地区和民族

① 《海上花列传》第七十二回《章秋谷名花成眷属张书玉陌上遇萧郎》。

② 《“去发”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4月9日。

③ 孤君：《洗澡》，《心灵的驿站》，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15页。

的差异,凡在政府任职的官员,概统一着装。1912年5月,袁世凯命令法制局:“博考中外服制,审择本国材料,参酌人民习惯以及社会情形,从速拟定民国公服、便服制度……议定中西两式。西式礼服以呢羽等材料为之,自大总统以至平民其式样一律。中式礼服以丝缎等材料为之,蓝色袍对襟褂,于彼此听人自择。”^①经过有关部门的会商并反复讨论之后制定了《服制》,同年10月以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布,将男女礼服的制度规定如下:

男子礼服分为两种: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有昼晚之分。昼用大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平,前对襟,后下端开衩,用黑色长过膝的靴;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晚礼服可穿露出袜子的矮筒靴。常礼服两种:一种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惟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另一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均黑色,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用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有领,左右及后下端开衩,周身得加以锦绣。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裱,上缘两端用带^②。

这些礼服都是学习西俗的缘故,最根本的是没有等级的差异,打破了束缚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服饰制度。辛亥革命与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具有最本质的不同,就在于这种社会的进步,完全可以在服装的变化与发展上显现出来。

二、颠覆传统意识

在服装方面,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传统意识,这些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束缚人们的头脑,也左右着人们的穿着方式。

清末男人袍衫,均窄袖长身,马褂甚短小,鞋则均穿无脸者,乡闾为之谣曰:“束手无策袖子,提心吊胆马褂儿,无舱面的鞋,扫地出门的袍子。”然不久民军革命,清帝退位,此种谣言果然应验,岂天默默示之以机欤!不然,何谣言之相应乃

^① 《袁世凯饬定民国服制》,《申报》1912年5月22日。

^② 《政府公报》第157号,1912年10月。

尔耶！时至今日，衣服由长身而变为短身，自窄袖而变为宽短之袖，裤腿亦短而宽。帽，则除大礼帽、常礼帽外，有所谓平顶冠者，以皮为之；有所谓牛鼻草帽者，以麦秆为之；有所谓土耳其帽、猴儿脸帽、来回避帽，名虽有三，其实则以毛绳为之一帽业。鞋，则分棉、夹两种。棉鞋夹有半截靴、三片扣两种。夹鞋夹有以方口名者，以一向湾名者，然尤以无脸鞋者为多，而此前之浅口双条脸福字履鞋，盖鲜。袜，则除白布作常式外，有著各色洋袜者^①。

上述记载将清末民初时期的服装变化说得很清楚，既讲了辛亥革命前后服装的不同，也叙述出各种各样的服饰形式，这种对于传统服装的颠覆，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结果。

早在19世纪末，剪辫易服的呼声鹊起，有少数人带头穿起了洋服。当时在大连诞生了西服制作的第一个流派“哈派”，日俄战争后又出现了“日派”，但多为外国人服务。据《胡汉民自传》一文介绍：1903年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胡汉民“岁时令节，容许学生披洋衣揖孔孟”，表明当时青年穿洋服的人渐多。辛亥革命，清廷覆灭，男剪辫、女放足后，曾掀起过一阵洋装热，连在偏远小城湖南慈利，“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女子亦间有剪发洋装者，北京的女学生甚至有了“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环高垂，皮鞋耸底”的摩登打扮。此后，虽有波折，但西服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②。

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制度，也颠覆了传统的衣着观念与意识，其表现在服装的款式、颜色以及穿着方式等方面，但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不是立竿见影地出现的。早在辛丑（1901年）孟冬，女子穿冬天棉衣，高领，右衽，衣短，齐臀；到了1915年，上海爱国女学生国文专修科生的照片：短衣，白色，高立领，下裙为黑色，长及鞋面。

白色的衣裳及白鞋子过去都是民间所忌讳的，辛亥革命之后，这种传统的观念被打破。“白鞋子，在从前还是有孝服的人穿的，自欧风渐进，凡在学校读书的

①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②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学生,以为夏天宜尚白色,而于足上每喜穿白帆布鞋,以为时髦。不独男学生如此,女学生亦仿而行之,不独学生如此,非学生亦多尤而效之,而白帆布布鞋,遂极盛一时。”^①

白帆布鞋子的流行,首先是颜色禁忌的消除,人们不再害怕白色,而将白色作为一种色彩来看待,而不仅仅认为其带有人为主观色彩,即在西方将白色作为吉祥、纯洁的符号,中国人则认为它是不吉利的色彩。辛亥革命前后,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吸收西方文化的元素,不再将白色作为一种象征死亡的色彩,因此会在鞋子上利用这种颜色。其次,帆布鞋的流行也是一种新的服饰文化的流行,它改变了过去一直是皮革、布料制作的鞋子,而增加了一种新的鞋子制作的面料。可见,这两种因素决定了当时白帆布鞋子会成为一种流行。

中国人传统的服装,一般都以黑、灰等暗色作为主要色调,到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格局基本被打破,呈现各种各样的服装色彩。

《上海颜色问题》^②一文说:

上海人的穿着,对于颜色是很考究的。有些人喜欢浓艳的颜色,有些喜欢淡雅的颜色,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佳处。

上海的男人,穿红色的衣服,可真是最少数,这因为红色的颜色,太是浓艳,穿了太觉武气,并且也不能普遍,自从哗叽流行,灰色满街都是。这种颜色,很文雅,又很朴素,可算是极的极合宜的颜色了。

淡色对于妇女,也不是绝对的不流行,也有许多女子,非常喜欢淡色,女学生尤甚,最喜欢用白色和灰色。

女性的目光,自然和男性的不同。他们喜欢浓艳的颜色,喜欢复杂的颜色。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新出的衣料,同样颜色的,只有这么一匹,那末他们一定很高兴,以为没有人和他穿同样的,是极出风头的事。

这段文句,说明 20 年代上海人的穿着有了很大的变化。男人从流行穿着大

① 《上海之声色》,《新上海》1925 年第 6 期。

② 《新上海》1925 年第 1 期。

红色的衣服,到喜欢灰色的哗叽;女人的衣服色彩更是名目繁多,艳浓的、淡色、白色、灰色,尤其不喜欢与他人有同样颜色的衣服。这种富有个性的审美眼光,反映了自由开放的文化性格。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多样性取代了单一性,个人的喜好取代了阶级的等级观念,是辛亥革命之后衣服颜色演变的结果。

也有人认为:“好多年前,紫色的衣服只有贵族们可穿,这并不是阶级的区别,却因着紫色的代价太贵,非贵族们购买不起的缘故。”^①这是一种关于紫颜色的禁忌。此说,对于民国初期有一定道理,但在封建社会里,紫色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有一种“章服制度”,帝王和百官公卿所穿的衣服,底色和花纹都有一定的规定,作为区别身份等级的标志。封建统治阶级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把青、赤、白、黑、黄当作“五方正色”,即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黄色即代表中央,又代表大地,所以帝王的服装就采用黄色。帝王以下的百官公卿,也要各按品级穿着规定颜色的官服。唐朝规定:三品官以上穿紫色衣服,四品、五品穿绯,六品、七品穿绿,八品、九品穿青;宋朝基本上承袭了唐朝的制度,凡衣紫色,绯色者皆有,但其作用不再是验明身份,而是区别贵贱的符号性饰物。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颜色更主要的是为实用服务的。

比如袜子的颜色,就以黑色为主。“袜之颜色甚多,只以上海地方,灰沙颇重,如穿各种颜色袜,在马路走了一回,就得罩上一重灰沙,殊不雅观,于是经济家改穿了黑袜。不料一般人乃以黑袜为出风头,以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全穿黑袜了。”^②

除了颜色之外,新的布料的运用,以及穿戴的改变,也都是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

1929年福建《同安县志》:“男女常服皆尚长,而今尚短;普通多以棉布为之,

① 《上海男子的观察》,《新上海》1925年第1期。

② 《上海之声色》,《新上海》1925年第6期。

今则衣丝绸、呢绒、哗叽者日多，一套衣服可抵中人一家之产。帽，士人及商家多戴瓜皮贡缎帽，庶民则以布节缠首；今则夏凉笠，而秋呢帽（俗名“招瓢”）。履，昔多双梁布鞋，镶云缎鞋惟士绅服之；今则以革履为雅观，而且眼戴金边镜，手执镶金杖，此风倡自学堂，谓此不足称时髦也。”

这里所说的呢绒、哗叽，瓜皮贡缎帽、秋呢帽，镶云缎鞋等，无不打上外来文化的印记。

在福建等地，妇女也大多数改变传统穿戴方式，而更多地向着现代流行文化靠拢。根据1929年《同安县志》记载：过去“妇女出门，向多以帕幂首，阔袖，执红漆杖，左宗棠曾称为邹鲁遗风；今日潮流崇拜文明，秃襟窄袖，短裙，携洋伞。今则并此而陋之，遂以短袖齐腰，丝袜革履，竟称雅观”^①。

这种颠覆服装传统是人们自觉的行为，而不是外来力量所导致的强迫改变过去的穿着轨迹，他们追求新的生活，势必会将自己原来的服装文化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自觉。

《上海男子的观察》：“上海仿佛是一只熔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柴煤炭，最熔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须一年即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熔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二大条件，都变成了上海式，至于一衣一履之微，那更不用说了。说也奇怪，不但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远迢迢的到上海，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人。”^②

2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服装文化的领导者，世界最新的服装潮流首先在上海登陆流行，最流行的服装款式也是最早在上海街头流行起来，因此上海的服装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时尚之都。特别是他们到了上海之后，更是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服饰打扮，从而融入上海文化之中，就连外国人到了上海也能够“上海化”。这是上海的服装文化具有超前性、包容性、世界性的体现。

①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4页。

② 《新上海》1925年第1期。